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生命—形式：被規範的常模形式，或是可開創的獨一性形式？

Form-of-Life: Life as a Normative Form, or a Created Singular Form?

doi:10.6752/JCS.201512_(21).0001

文化研究, (21), 201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 2015

作者/Author：編輯室的話

頁數/Page：4-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01](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生命－形式：被規範的常模形式，或是可開創的獨一性形式？

Form-of-Life: Life as a Normative Form, or a Created Singular Form?

——編輯室的話

生命如何展現自身的形式？生命如何被看見、被計算、被感受？生命形式是被國家治理、教育養成、語言政治、文化傳統、資本科技發展而規範的常模，還是可以使用任何即手可得的語言與物件，創造出自己生命的獨一性？戰爭、饑荒、暴政或是貿易流通而被動或是主動遷徙的人民，經歷集權而啟動民主化的社會，從帝國版圖轉型為民族國家的混雜政體，多重殖民歷史後遺而並存的社會體制與曖昧認同，生理常態規範下無法描繪甚至尚未成形的性別生命——在這些處境之下，生命必須面對尖銳的形式難題，而這些難題也必然都是政治性的問題。《文化研究》第二十一期收錄的五篇論文，以及關於殖民後的馬華認同論壇，雖然處理不同的議題，實際上卻都環繞著這個「生命－形式」的核心問題，而以不同面向展開作者各自的思索。

劉紀蕙的〈勢與形：新自由主義資本邏輯美學化之死亡形式與生命形式〉，直接切入何謂生命形式的問題，以及潛勢與形式之間的張力。該文透過傅柯(Michel Foucault)與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的生命治理概念，說明二十世紀的生命治理技術，透過統計、圖表、概率，將生命以利益、功效與安全的計算邏輯，劃分為功能性或是生物性的單面化形式，是一種經濟學式的全面治理；就其極端的發展而言，其實已經是生命治理的死亡形式。劉紀蕙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當代法國漢學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以如此靠近中國古典思想的繞道而行，探討中國獨特的「勢觀」，卻以一種隱藏的方式，呼應了阿岡本所分析的西方神學經濟範式，也不自覺地將他的中國哲學分析置入於典型的西方政治哲學之內？除了進行朱利安與阿岡本論

述的分析之外，劉紀蕙也透過當代大陸藝術家徐冰作品中的「物件」配置，說明當生命進入功利性的配置與消耗而成爲死亡形式，徐冰的作品卻可以重新使用被消耗的物品以及死亡形式，展現出新的生命形式，不僅以他的行動畫論駁斥了朱利安的山水畫論，也透過他的作品提出了對於後1989新自由主義席捲之下全面資本美學化的批判。

關秀惠的〈宣稱見證二二八事件的木刻版畫：黃榮燦〈恐怖的檢查〉暨其木刻創作〉，與張雅梁：〈泰國泰族特性的轉變：以水牛樂團和Pi Bird皇家歌曲歌詞爲例〉，這兩篇文章都是探討政體轉型之下，討論靠近民間的文藝形式如何反映出了人民的生命狀態。

關秀惠分析木刻版畫家黃榮燦從中國左翼木刻傳統到來臺創作，他的藝術作品如何以身體涉入生存環境的方式發生了轉變，並且以藝術形式見證了歷史事件背後一個時代的社會狀況。從大陸來到臺灣的雷石渝與駱駝英等左翼文化人士，由於過去抗戰歷史以及蘇聯現實主義文藝的背景與臺灣文藝創作者的經驗不同，而產生了辯論與爭執。黃榮燦則以實際參與民間創作的方式，既延續了由魯迅所倡導的左翼木刻運動對於現實感高度要求的傳統，希望透過文藝的大眾化與思想啓蒙而帶動人民的解放，卻也因爲身處並目睹臺灣的社會狀況，因此逐漸脫離了抗戰時期描繪後方軍事重建與宣傳教化的附庸痕跡，以更爲靠近民間社會的方式，描寫底層生活以及人物形象，而激發了觀者感同身受的經驗，並且見證了二二八歷史事件發生時整體社會脈絡。

張雅梁所討論的水牛樂團和Pi Bird皇家歌曲兩個流行音樂樂團，則反映出在泰國長期強調國家、宗教和國王的泰化政策以及國族認同教育之下，雖然經過解嚴以及民主化的過程，出現了具有批判力、關注社會議題、要求弱勢族群平等權利的水牛樂團，卻同時也有讚揚皇室榮譽、強調尊王愛國而高度受到人民歡迎的Bird樂團。這兩類截然不同的流行音樂樂團的並存，說明了所謂的「泰族特性」以及人民情感的內部矛盾。

關秀惠與張雅梁以民間文藝形式反映出在不同政體與不同政策之

下的人民生活與認同問題，侍建宇的〈蘇聯介入與現代維吾爾民族主義的興起：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不同史觀的討論〉，則以更為複雜的歷史轉型過程，討論對於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不同歷史詮釋，所反映出來的維吾爾民族問題。侍建宇提出的問題是：從大清帝國的版圖到現代民族國家的結構性轉換過程之中，為什麼出現了對於二十世紀上半期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不同歷史詮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是所謂的「三區革命」的人民革命，蘇聯外力介入，還是維吾爾民族主義的興起？為什麼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成立至今，當前新疆地區的民族問題再度轉趨嚴重？侍建宇指出，這些不同階段的歷史詮釋，也顯示出整體政治局勢的轉變。

在侍建宇梳理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岸學者關於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不同歷史研究資料中，我們看到，1940年代中期，張治中擔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代表國民黨與伊犁政權談判，同意按照民族比例參政、宗教自由、限制漢人移民新疆、讓地方掌控自然礦產資源，以便國民政府與伊犁政府共組民主聯合政府。雖然後來因為國民政府猜忌張治中的傾左，導致張治中辭職而他的聯合政府和平治理政策沒有成功。今日看來，這個能夠讓不同民族和平共處的聯合政府模式，是相當進步的。但是，誠如侍建宇所言，歐亞大陸上的泛突厥主義包含了各種不同內涵的認同，維吾爾、哈薩克、吉爾吉斯、蒙古、白俄歸化族、東甘／回族之間，有各種不同性質的矛盾關係；而新疆地區複雜的族際關係，自然也無法透過建省改制或是重構認同，而化解族際衝突。這些不同族裔之間的衝突，在當前社會體制與政治治理模式之下，在不同地區有以不同型態的階級矛盾展現，也持續爆發社區內的恐怖攻擊，看來是二十一世紀面對的真正難題。

相較於前面四篇處理政治生命形式的論文，洪凌的〈反常肉身奇觀，跨性酷異戰役：再閱讀科奇幻文學的酷兒陽剛與負面力量〉，雖然處理的問題是科奇幻文學與酷兒理論，卻正好可以藉由一種轉喻的方式，呈現出永遠尚未成形的生命狀態，而呼應了關於政治生命形式

的問題。洪凌所討論的酷兒跨性男同性戀奇幻乖張的身體展演，無法以任何常模或是變態的方式，進行歸類。洪凌說：「尚未成為整體者的面目散逸橫生於許多場域，透過無法清晰、拒絕簡化的語言與樣貌，周遊穿梭於文化再現的地景。」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在「形」（常態）與「影」（污名化的邊緣身分）之間無法歸類而騷動的「魍魎」，正可以視為所有生命尚未成形卻在常規與邊緣之間出現的酷兒罔兩狀態。這些罔兩狀態如何尋求暫時的獨一性形式出現，便是根本的政治性問題。

本期由編委王智明以及客編張錦忠所合作規劃的「回憶殖民後：「馬華」認同、帝國歷史與文學創作」，將殖民歷史經驗以及複雜文化認同的時間軸線拉長，而使生命與形式的矛盾展現的更為尖銳。從十五世紀鄭和下西洋開始南向移民而成為麻六甲（Melaka）混血土生的岬岬娘惹，到葡萄牙、荷蘭以及英國先後的殖民歷史，以及十九世紀以降因為鴉片戰爭、太平洋戰爭以及冷戰時期，以不同身分輾轉南遷的客家人、廣東人、閩南人等不同地區的華人，這些由外移入馬來西亞社會的不同族群以及不同語言文化，與當地更為複雜的不同本地族群共處，而形成了複雜的多族群多語言並存的社會。馬來西亞華人無論是「三代成峇」而土著化，或是如同「天朝棄民」，始終以懷鄉的情感試圖依附遙遠古老的文化故土，或是隨著殖民教育而完全西化改姓，或是再度移居世界各地而落地生根，這些不同時期的歷史教育與生活經驗形塑了不同的生命情感，鮮明地揭示了以語言展現形式的生命本質，也指出了無論是在馬來西亞或是在各個移民社會，不同族群移動共居並且持續重構社會的事實。此外，正由於各地的社會都是由不同歷史時期移民或是不同型態殖民所形塑，也由於不同的語言政策導致不同的族群分化，因此認同問題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面對不斷重構的社會以及變動中的全球局勢，如何能夠以平等位置接納居住並且共構社會的不同族群，反而是更為重要的問題。

除了上述五篇研究論文之外，本期也特別針對今年（2015）日本安倍政府在參議院通過安保相關法案所引發的大規模反安保示威運動，規劃了一個「評論」專欄，收錄了詹亞訓的〈反安保運動：戰後日本憲法的觀點〉，以及馮啓斌、崎濱紗奈的〈第三次反安保運動下的沖繩基地問題：從SEALDs談起〉兩篇文章。日本在戰後1947年施行的《日本國憲法》，又稱《和平憲法》，其中第九條明文宣布放棄戰爭：「以正義與秩序為基調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家主權發動戰爭，以及以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但是，1951年到1960年完成簽訂的美日安保條約，卻將日本再次置入戰爭的潛在狀態，也使沖繩成為美軍長久駐紮的基地，成為高橋哲哉筆下國家犧牲體制的延長，而引發無法解決的內部衝突。這兩篇文章從安保法制與日本憲法內部的矛盾，以及沖繩在這個矛盾環節中被忽略的位置，進一步將主權概念下的法律問題以及兩大政治權力之下關於沖繩的民主問題尖銳化，正讓《文化研究》的讀者有機會從日本反安保運動出發，以不同的角度，較為深入地了解反安保運動所牽連的問題。

本期洪士惠的書評，討論在中國崛起的脈絡之下，姜戎《狼圖騰》和楊志軍《藏獒》兩本小說中的動物敘事政治，也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論述角度。

《文化研究》將於2016年陸續刊登關於香港後九七社會狀況，台灣太陽花運動，以及法國境內兩度恐怖攻擊的回顧與分析的專題。無論是國內或是國外的局勢變化，都是相互牽動而值得學術界以不同方式介入的議題。本刊持續歡迎國內外學界同仁賜稿。無論是研究論文、研究紀要、思想論壇、思想翻譯、影像書寫、田野筆記、專題訪談或是各種評論，包括書評、展評、影評、會議報導、政治事件或文化事件評論等，本刊都高度歡迎。

劉紀蕙

2015年冬於山湖村